

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

前言 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慈善世纪

洛克菲勒这个名字不常与中国相连——或许与亚洲艺术和日本有关，但不是和中国。然而，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主要外国受惠者，标准石油则是在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前三位洛克菲勒参与中国事业的时间从美国内战一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年代。今天，多个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继续着开始于一个世纪前的在中国科学、医学及艺术领域的种种项目。整个 20 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接近 8 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美国来源。¹

1

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映照出一个半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洛克菲勒家族对商业、宗教、科学及艺术的兴趣也概括了塑造中美关系的多维度的非政府力量。

一个世纪前，美国科学家希望向欧洲寻求训练和灵感。很少有人想象过这样一个时代，与中国的科学协作成为第一重要事务，或美国教育出来的中国人有一天会在一些领域主导中国的科学精英。今天，中美之间深远的智力联系正在变得与美英在 18、19 世纪初的教育联系或者美德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科学联系同等重要。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是什么力量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 20 世纪超级大国的知识界近身遭遇？展望前方，中国的大国崛起又会如何改变她与美国文化关联的性质？

本书的核心命题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对中国精英科学和医学的持续关注使不受教会束缚的美国科学得以在中国合理存在，并使一种专业化关系的传统得以成长，甚至幸免于特定时代的干扰。洛克菲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与洛克菲勒优先关注点的趋同。不同于几个世纪前的耶稣会士，洛克菲勒在时机上是幸运的。现代科学成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国民党的民族兴起，再到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贯穿整个世纪——在某些方面即便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与洛克菲勒及其余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下——洛克菲勒的慈善使命始终可以与中国更广泛的需求协调一致，即掌握科学，以追求民族的“富足与国力提升”。

2

本书主要集中于科学和医学，但也阐述了洛克菲勒慈善网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怎样促进了美国对亚洲文化的理解。洛克菲勒二世和他的儿子洛克菲勒三世的中国收藏已经成为全美博物馆的一部分。洛克菲勒二世的妻子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欣然接受亚洲的艺术、庭园风景和宗教，并把这些兴趣传递给家人和友人。美国最早对中国研究的支持，包括语言和图书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时间是1920年代后期，比福特基金会开始其大笔资助还早二十年。美国与中国文化相遇演进的性质——包括艺术、人文，也包括科学——往往经由洛克菲勒的参与和引领，始终有洛克菲勒的参与。

到现在为止，洛克菲勒家族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故事，还只是被零星地讲述。直到接触到家族的日记和信件、学院的档案，采访了中医领袖及几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员，我们才能够对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与中国的相遇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洛克菲勒家族的兴趣从商业到宗教再到医学和科学的进展，及其与亚洲艺术日益浓厚的密切关系，不仅本身就趣味横生，而且对于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很重要。早在1920年，洛克菲勒二世和阿比的世界观里就已包含了对中国宗教和艺术的赏识——甚至包含了这样的信念：中国不但在文化上重要，在政治上也同样重要。他们还把对亚洲文明的热爱传给了他们的六个孩子：阿比、洛克菲勒三世、纳尔逊、劳伦斯、温斯洛普和戴维，并渗透到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中，这是因为他们的家族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更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帮助塑造了他们创建的至今影响深远的机构。这些洛克菲勒机构的数量众多，但介入中国最深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CMB，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亚洲协会和亚洲文化委员会。

洛克菲勒家族参与中国的规模和持久性给历史学家提出了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将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是否有统一的主题，能够对我们的诠释有所帮助，并将这一个世纪以来跨越太平洋的叙述贯穿起来呢？“强盗男爵”和“文化帝国主义者”是老洛克菲勒和他的国际慈善事业赢得的两个雅号——却也不无道理。他的大多数传记，即使是最近的、最善意的，也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他的垄断生意而不是他的慈善事业上——尽管他关于后者的遗产可以说更为久远。20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的智力覆盖范围能像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更好地例证“文化帝国主义者”。基金会采用了看上去慈善的座右铭——“促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将美国科学和医学思想作为样板，应用于如英国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那样差异巨大的国家。宗教和解与霸权的理念指导着本研究的早期阶段——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最初的慈善动机；标准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同时介入；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或称“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的创办。

然而，“强盗男爵”和“文化帝国主义者”这类受时代限制的、单维度的漫画式用语，可能会阻碍我们探究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机构的多面性，特别是中国文化、科学和政治对他们的多重影响。因此，我选择了另一种更为中立的视角来观察洛克菲勒横跨动荡的20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该视角取自入江昭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概念，专注于探索对外交关系性质的影响等同于，或者某些时候有甚于传统的国家关系的非国家作用力。入江昭将文化国际主义定义为“寻求通过跨国的合作与交流来重塑关系性质的一种思想、运动或机构。”³这一细腻的概念重视的是思想界和知识机构的重要性。这种概念认识到文化并不总是国家的侍女，文化关系的样式并不一定取决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由此，入江昭这样解释文化国际主义和中国：“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教育和学术交流的深刻发展表明，权力和文化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即权力并不总是决定文化，而文化也不必寻求权力的支持。”⁴文化国际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探寻洛克菲勒家族几代人的角色变化、隐含观点及其在中国的机构化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文化国际主义”中的“国际（inter）”词素表明了中国及其人民、文化、机构在塑造洛克菲勒历史遗产中所起到的作用。

艺术是20世纪文化国际主义的一个领域。即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清廷积弱、美中政治关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时候，亚洲艺术和美学就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美国文化。⁵阿比·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二世，还有许多美国人，在洛克菲勒慈善事业进入中国前很久就已欣然接受亚洲艺术。事实上，他们对亚洲文化的欣赏直接影响到其对慈善事业的想象。科学是文化国际主义的另一个领域。西方科学和医学向中国的输出主导着洛克菲勒机构的历史进程。首批洛克菲勒顾问相信，西方科学价值观的传达将会导向共享的文化和政治范式。⁶但一些分析家可能遗漏了对洛克菲勒历史进程同样重要的东西：对科学本身的重视、与中国分享美国尖端科学以及让中国科学家融入世界科学大家庭的渴望。

在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科学规划的核心就是创建一个没有国家或政治边界的科学共同体。这一使命正好例证了尤金

·拉宾诺威治的科学国际主义概念，这是将科学植根于全球化科学世界的理想观点。正如他所说：

在其核心是一套科学行业共同的传统与理想：科学知识在全宇宙都是有价值的，科学方法与实践必须不受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在所有国家或民族的专业人士中，不加限制的学术交流对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至关重要，而科学本身就是一种际语，它倡导全球性的视野、统一的目标以及基于普世美德的秩序。⁷

“全球科学专业化”（global scientific profession）一直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欧洲国家在争取科学性的启蒙时代初期就组建了学术机构和专业来分享跨越边界的科学知识。20世纪出现的“无限制”学术交流意在倡导超越政治界限的科学。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在全球展开及其与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联系，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倡导和资助跨国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将盛行的跨大西洋科学组织扩展到太平洋。中国首先被纳入这一新的轨道，这给中美两国的科学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本书将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作为多层次文化国际主义的一个案例来写，共有四个相互交织的主题。首先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国故事，开始于1863年老洛克菲勒为中国传教活动捐款十美元，结束于2007年在北京为“油王”雕像举行的令人难忘的揭幕典礼。老洛克菲勒与子孙的中国理念和经历，构成了连接第一章“起源”、第三章“政治”和第五章“再生”的叙事主线。他们与亚洲艺术的偶遇和他们五十年持续介入中国的战略，显示出家族多代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基金会创始人及其后裔在基金会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有意思的是，洛克菲勒二世和洛克菲勒三世都是既和中国国民党又和中国共产党打过交道。在那些年中，标准石油作为家族的生意不仅提供了资助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资源，还为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始终在场的背景。

第二个叙述主题介绍了专业慈善家——总裁、官员、在中国的员工等——他们如剧中人一般进入了洛克菲勒家族。正是这些职场人士的远见——包括纽约的格池、福斯迪克和约翰·诺尔斯以及在中国的兰安生、罗杰·顾临、谢尔顿·西格尔和施瓦茨——决定着具体的慈善项目。第二章“历程”和第三章讲述顾临和兰安生的故事，他们都是几乎在中国服务了20年的宿将。他们各自成为独立的角色，极大改变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民国时期的进程。第五章专注于20世纪最后

30年，审视了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于1980年重返中国的情形。在最近的这段时期，中国项目并无什么独特之处，而更像是融入了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化进程。即便如此，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仍然得到了惊人的延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CMB将医学和科学当成首要任务，其机构建设和全球研究网络风格贯穿了整个20世纪。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机构——历经战争、革命和迫害的考验——是第三个叙述主题。在一个世纪里，数百家中国机构和数千名中国学者及从业人员得到了洛克菲勒的支持。他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吸收、改变、再造了美国的知识，而有时又将之完全抛弃。这些机构的起源、年轻中国知识分子早期的作用及洛克菲勒中国网络的扩展均在第二章中做了介绍。第四章探索了这些机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命运。“存续”一章是关于洛克菲勒的旗舰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案例研究。我在许多年的过程中采访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有关人员，得以构建一部北京协和医学院师生在动荡岁月的集体传记。这一可辨识群体的案例研究让我们能够对洛克菲勒资金支持中断很久之后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一个层面作出评估。

本书大概顺序主要是按照年代展开。以美国人寻求开发和改造中国这个“东亚病夫”开始，结束于美国在中国正变成有竞争力的世界强国之时重新调整其策略。第四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叙述主题揭示了美国对中国持续的文化冲动，跨越四次战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内战及朝鲜战争），经历了三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一直进入21世纪前十年。在第六章即最后一章“遗产”里，描写了当代美中文化关系，其中包括200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九十周年庆典，2006年亚洲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均说明洛克菲勒家族和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对中国持续的和变化中的兴趣。

我们了解到洛克菲勒家族第四、第五代人参与中国的情形，也了解到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强国正在改变着洛克菲勒慈善性质的新方式。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洛克菲勒家族的理念和慈善重点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楷模。

这四个叙述主题并非故事的全部。正如我的第一部书——《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主题和1970年代所能得到的资料，今后的几十年将会有更多中国机构的档案得以开放，医学和科学回忆录也会日益增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档案只对我开放了一部分。1949年前的资料有望即将开放，1950年以后的资料或许有一天也会开放。洛克菲勒基金会、国民党政府与标准石油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会在当前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档案的工作中浮出水面。医学传教包括对个别医院的研究，现在正受到中美两国史学界的新关注。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在寻求理解西方医学的社会内涵及其与传统中国文化和医学的相遇。在此简略描述的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最近重返中国的情形有待详细认真的考察。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得出结论，洛克菲勒和中国人民共同支持的事业，以及洛克菲勒慈善事业赞助的机构，对两国的知识景观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他们也都承认，所发生的一切并非没有争议。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今天，美国和中国密不可分，医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及高等教育以及商业和地缘政治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理解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在中国的起源、演变、间断和再生，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这些关系的性质和坚韧性。最后，我们发现——或许很吃惊地——洛克菲勒的中国故事也是美国的中国故事。

一、起源：医学、艺术和石油

1863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卖给中国第一批煤油，为中国传教活动捐了第一笔钱，¹ 那年他24岁。洛克菲勒做梦都想不到，他的石油公司和后来的基金会竟会在某一天成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和商业的形象，也想不到他的财富可以为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国际化做出贡献。但是，就在他那么年轻时，他的想象力已不局限在克利夫兰郊区。

在1860年代，美国和中国都处于毁灭性的内战之中。只是在1863年的盖茨堡战役后，美国才清楚联军将会最终取胜。同样，受基督教启发的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威胁着清廷的统治。《克利夫兰先驱晨报》（*Cleveland Morning Leader*）每天报道美国内战的消息，同时也记录着太平天国的进程，形容它是“人类生命的屠戮”，还有对杭州战役的详细描写，暗示人们中国的灾难看上去远比美国的血腥内战更加深重。²

洛克菲勒对这幅更宽广的国内国际图景——美国奴隶和异教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的了解，反映在他早期的慈善事业中。最近的一位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称他“极为慷慨”，这位热心浸礼会的年轻人在捐助时不拘对象：他捐给黑人教堂、天主教孤儿院，也捐给卫理公会、浸礼教的传教活动。³ 他年轻时的慈善行为源于母亲赛蒂对援助他人的重

视和他的伊利街浸礼会会员身份，以及他在二十多岁时对课外活动的关注。他不仅参加三次周日礼拜，还出席周中的祈祷会。1857年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从而拓展了他的宗教和国际视野。⁴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建立于英国，是个面向国际的普世基督徒团体。后来，它把洛克菲勒和他的儿子都带入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运动。

洛克菲勒教会生活的一个常规部分就是号召支持浸礼会在国外的传教活动。即使这样，在1863年支持中国传教活动，依然算是早的。在中国的浸礼会传教活动当时确实很少。第一批传教士于19世纪30年代到达，仅限于澳门、香港；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后，他们出现在上海、宁波和广州。第一个浸礼会教堂于1847年在滨海城市宁波开设。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结束了鸦片战争，并迫使中国对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其内陆地区。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在全中国还有不到十个浸礼会教堂。⁵不管怎样，洛克菲勒所在的宗教社区知道中国的传教活动；一位著名的克利夫兰公民的儿子就是长老会的传教士，另外至少还有一名叫作麦高文的传教士公开宣讲他在中国的活动。⁶

尽管在仍然置身内战的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必然没有什么位置，但洛克菲勒最早对中国的了解并不限于教会。克利夫兰也许是个只有25 000人的小镇，但并不闭塞。它位于伊利湖畔，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重要的铁路站，也是一个地区运输中心。到19世纪60年代初，五万多主要在西部的中国移民正在建造美国的铁路，对中国的商业运输也正要起步。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克利夫兰先驱晨报》定期发表中国的参考资料，包括香港茶叶种子和中国甘蔗的广告。有12艘克利夫兰的轮船预计在1859年往来于太平洋上。对中国人的好奇心被描述为：“中国人是个奇怪而古老的民族，仍然把长城以外的人看成‘外面的野蛮人’。”当一个俄亥俄州的代表团接受“旧金山六家中国公司”的款待时，晚宴上了130道、336个菜，包括“燕窝汤”。1865年，媒体欢呼说“开通从旧金山到中华帝国和日本的重要港口之

间的每月邮路……这件事的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为过。”⁷ 中国的人口令人惊叹：“数不清的‘天朝之人’。人口总计竟达四个亿！……人的大脑一时把握不住这么大的数字——四百个百万！到底意味着什么？”⁸

它当然意味着四亿个灵魂需要拯救，四亿盏灯要点亮。定期跨太平洋航运的出现使得刚刚在克里夫兰的后院找到的石油能够运达全世界。洛克菲勒的中国慈善事业恰巧与他进入石油行业以及向中国首次出口煤油同时展开。洛克菲勒在克里夫兰的第一份工作是会计，可到了1858年——他18岁时——他就开始同莫里斯·克拉克做生意。他们的公司是个经纪行，买卖多种产品。一年之后，在宾夕法尼亚距离克利夫兰不远的梯图斯维尔发现了石油，我们不妨说以后的事就是历史了。尽管洛克菲勒开始对石油的前景还有所怀疑，但他和克拉克在1863年就买入了他们的第一个炼油生意；正是石油的净化和提炼生产出了第一批煤油。根据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的历史学家所说，第一批煤油有一些是经过纽约运往中国的。⁹

中国对传教活动和石油的开放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加速了。赴华美国部长蒲安臣于1865年公开访问克利夫兰，推广新的扩展了的条约体系，它为美中关系提供了更具预见性的法律结构。作为克利夫兰最有前途的年轻商人之一，洛克菲勒有可能见过蒲安臣并听过他的演讲。当然，蒲安臣访问的意义在克利夫兰的报纸上也提到过。¹⁰ 蒲安臣在将美国纳入英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后制定的条约框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说服了欧洲人限制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为美国赢得了中国官员一些最初的好感。

对于传教士和商人，三个最重要的条约条款是治外法权， Unlimited 进入全中国以及保证按价计征关税只有5%。治外法权确保美国公民在中国法律及起诉面前有豁免权，这成了所有条款中最有争议的一条，直到1940年代才被废除。低关税结构几乎七十年没有变过，尽管在1920年代，为了获得中国更有利的市场，美孚最终接受了一些附加的关税。对于中国人，这种“不平等条约”后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示威的焦点所在。在19世纪后半叶，地方上对传教士和商人的反对时有发

生，可是清政府实在过于软弱，无法改变强加给它的半殖民关系。

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卖给中国煤油还只是成长中的洛克菲勒石油生意里较小的部分。那时国际贸易主要由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经营，而这家公司是他的兄弟威廉领导的多个标准石油的托拉斯之一。洛克菲勒随时了解国际国内事务。到 19 世纪 80 年代，他很清楚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标准石油的一位职员威廉·利比曾在 1882 年在美国副领事班迪奈尔的协助下遍访中国。他们一起建议标准石油大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为了抵消荷兰、英国及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亚洲与中国日益增加的势力。¹¹

多年之后，洛克菲勒仍记得这场争夺亚洲石油生意的激烈国际竞争和“美孚”的起源，即供给中国的煤油灯：

标准石油一直在奋斗以保证美国产品能抵御来自俄罗斯大地的石油……及主要影响印度市场的缅甸石油。在所有这些国家，我们都会遇到针对我们而提高的关税、当地的偏见以及奇怪的习俗。在很多国家，我们不得不教给人们——比如中国人——烧油，通过我们给他们制造的燃油灯。¹²

12

为了促销这种非常便宜的煤油灯，标准公司印了许多中文的小册子和传单以吸引中国人：

如果你企望运气、长寿、健康与和平，就应该生活在光亮的世界里。应该使用最新生产的标准灯……标准灯像月亮一样亮……用标准灯会很高兴……夜晚工作时眼睛不会疲劳……如果有个孩子在家学习，在灯光下他会更加努力。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业进步呢？¹³

20 世纪 30 年代，阿丽斯·提斯代尔·何巴特的畅销小说《中国的灯油》后来改编成电影，使得美孚灯更加出名。“给中国的灯油”这句话成为中国市场节节败退的比喻，而事实上标准石油公司是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大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由于到处都有这种便宜有效的灯，“美孚”成了当地的白话。

克利夫兰仍然是洛克菲勒企业重要的基地，但迅速成长的石油生意让他于 1883 年举家迁往纽约市区。那时，垄断经营已使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几乎 90% 的美国炼油业和 80% 的世界市场。洛克菲勒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 20 人之一。随着他财富的积累及越来越高的知名度，他的慈善捐助——以及对他的要求与索取——也不断增加。他始终最关心浸礼会的事业，尤其是国外的传教活动，但同时也向个人传教士做了数百项零星的捐款。同年轻时一样，他的捐助仍然没有宗教派系的界限。他日益关注教育，持续给予丹尼森学院（Denison College）即如今的贝孔学院（Bacone College）捐赠。

但洛克菲勒把自己的特别关注留给了黑人教育。1864 年，他与妻子赛蒂在上纽约州度蜜月时，首次见到了两位已经开始在南方教育黑人妇女的浸礼会教育家，苏菲雅·帕克德和哈利艾特·吉尔斯。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络，几乎在二十年后，帕克德和吉尔斯于 1882 年访问了克利夫兰。洛克菲勒回应了她们的请求，开始支持她们在亚特兰大新建的黑人妇女学校。两年之后，他带领全家乘火车去庆祝学校成立三周年。帕克德和吉尔斯想以他的名字给学校命名，但他却选择了赛蒂娘家的姓氏斯贝尔曼（Spelman），以纪念她全家对废奴主义运动的贡献。¹⁴ 斯贝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成了全国最好的黑人女子学院，至今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仍是董事会成员。

19 世纪 80 年代，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承办一家宏大的浸礼会大学。经过与浸礼会宗教领袖和知识界领袖近十年的谈判，他令人惊讶地选择了支持旧约的神学家威廉·雷尼·哈珀建立芝加哥大学。帮助他进行最后谈判的是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此人强有力地影响了洛克菲勒随后的慈善事业。芝加哥大学体现了洛克菲勒对高等教育和大型慈善项目日益增长的个人兴趣。

这主要归功于格池，他从 1891 年起就直接为洛克菲勒工作，让“科学地给予”日渐成长并制度化，这也是洛克菲勒成熟的慈善事业的特点。不过到此时，洛克菲勒本人也已确立了几个主要的捐赠方向。他的宗教捐助已不限于浸礼教会。高等教育，而不是神学，正开始争

夺他的资源。通过资助像斯贝尔曼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这样不同的机构，他确认了自己毕生的信念，即教育机构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机构，能够让所有阶层、所有种族的人获得工作并传播美国价值观。正像他在写到芝加哥大学时所说的，“根据消灭万恶之源的原则，我们认为，帮助学院和大学是与愚昧斗争、增进有用知识的最保险的方法，因为毕业生会将其文化传播到深远之地。”¹⁵

基于这些原则，格池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规范洛克菲勒广泛的慈善事业；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为洛克菲勒介绍科学医学；第三个贡献是创建了几个大型慈善信托基金。格池还记得他刚刚接触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时的情形：

洛克菲勒先生每年给浸礼会国外传教协会捐几千美元，14
已成习惯。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小型的国外传教团体，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而他对此领域肯定没有足够的了解。
他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各浸礼会活动区传教士的个人请求：法
国、德国、俄罗斯、非洲、中国、日本及其他远东国家。他
们要求有大有小，涉及教育机构、医院、大型建筑物、场地、
设备、福音传道等。他的办公室、家里、桌旁常挤满了回国的
传教士，每个人都急切地期望为自己的领域争取到尽可能
多的支持。¹⁶

格池开始给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理出了轻重缓急，整合几个主要的组织给浸礼会传教士提供支持。在 1897 年，格池读到威廉·奥斯勒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医学原理与实践》，相信科学医学拥有发现疾病根源和减轻痛苦的钥匙。他不停地对洛克菲勒解释说他应该将慈善事业的焦点放在医学上。

理解约翰·洛克菲勒关注科学医学并部分地偏离宗教运动，是理解他大部分后续慈善项目的关键，包括他在中国的各项创举。洛克菲勒自己从未上过大学，但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他跟文人学者已经相当熟络。他个人从未完全接受现代科学医学，更喜欢继续采用顺势疗法。

但他却决定将所有慈善活动集中于“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最好的慈善事业是不断追求最终目的……追本溯源，就是努力在源头治愈恶疾。”¹⁷科学医学与之完全契合。19世纪末的医学成就将之带入了许多人称的现代医学的英雄时代。我们第一次可以说治愈甚至根除某种疾病，而不仅是治疗。

洛克菲勒的孙子于1901年死于猩红热，为此需求染上了个人色彩，也带来了最终的动力。同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同时请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任所长，以及一位病理学家、细菌学者西蒙·福勒克斯纳担任首位所长。这两位美国医学领袖成了洛克菲勒集团最重要的医学顾问，最后也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

20世纪最初几年，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前途光明，但洛克菲勒石油帝国却灾难重重。由于标准石油——及其众多隶属企业——控制了国内国际的石油市场，洛克菲勒的个人财富迅速增长，在1897年时其15 身价就接近两亿美元。在格池的监护下，洛克菲勒做出了最大一笔捐助，令其声名鹊起。然而，对他本人财富和标准石油垄断经营的争议也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顶峰。洛克菲勒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已经实现了行业控制，有许多做法被看成是非法的，包括铁路回扣，即提供给标准石油巨大的运输折扣；管道控制；强势收购竞争对手；贿赂监管官员等。由此形成了整体的纵向控制——从生产和炼油到运输和市场。

公众对日益壮大的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垄断公司的担忧，首先导致了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尽管反托拉斯法案相对来说不怎么有效，但是各州和联邦针对标准石油的调查和诉讼开始激增。到19世纪最后十年间，对洛克菲勒个人的批评也增加了，高潮则是流行杂志《麦克鲁尔》（*McClure's*）刊发了伊达·塔贝尔的系列揭露文章。洛克菲勒因违背商业道德，标准石油则因恐吓和扩大对美国石油生产的控制而遭到公众唾弃。对标准石油的多项诉讼也在1909年达到了顶点，这年圣路易斯一个联邦法庭一致裁决

标准石油及其 37 家附属企业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1911 年，最高法院维持裁决，标准石油帝国顷刻解体。

洛克菲勒家族平安度过了这场反托拉斯风暴，继续着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联系。出乎意料的是，洛克菲勒的个人财产并未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大大增加了。公众对这家新的多元化石油公司的兴趣（以及汽车用汽油的日益重要性）把股票价格推向更高。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持股比例依然很高；到 1913 年，他的净财富达 9 亿美元，是历史最高。美国那年的国家预算都比之不足——区区 7.15 亿美元。¹⁸

洛克菲勒二世，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洛克菲勒二世 1897 年刚毕业就踏进了洛克菲勒的办公室，就是这位洛克菲勒二世将领导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关于早年洛克菲勒对中国兴趣的研究，都强调了格池使中国医学项目理念化的影响（见第二章）。事实上，洛16克菲勒在中国的工作还没开始时，格池就曾于 1917 年放弃了中国，只留下洛克菲勒二世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圈子里主要的中国鼓吹者。因为本书宗旨在于纵向研究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国兴趣，我们的焦点是理解洛克菲勒二世介入中国的过程。

洛克菲勒二世生于克利夫兰，但他年轻时代在纽约度过，成长于虔诚的都市环境。求学布朗大学期间，本杰明·安德鲁斯校长的社会行动理念和风起云涌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令他大开眼界。¹⁹他和父亲一样，在十几岁时就定期向纽约一家华人主日学校缴纳什一税。他们同去的第五大道浸礼会教堂有一个活跃的圣经学校，在 1882 年就有 40 名“支那人”，其中 12 名被接受为教堂的成员。²⁰他也和父亲一样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在布朗大学时就接触到了青年会在中国新的活动。老洛克菲勒认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富有魅力的学生秘书马特，并已经在大力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尤其是它的国际活动。1890 年代中期，马特曾多次访问布朗大学，也与洛克菲勒二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轻的洛克菲勒二世开始在曼哈顿百老汇 26 号标准石

油公司总部工作时，他立刻被授权负责协调父亲与马特的慈善关系。老洛克菲勒资助了马特 1902 年的第二次亚洲之旅（第一次是在 1896 年），他的儿子则饶有兴致地阅读了旅行报告。这些关于世纪之交中国的戏剧性的叙述突出了教育与社会变革及福音传道的重要性。只比二世大十岁的马特成了他长期的心腹和顾问。²¹

一项关于中国教育的举措紧接着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为洛克菲勒集团的首批大项目之一，这并不奇怪。进步的美国一直在关注中国。除了传教士数目的增长，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兴盛，20 世纪初还见证了义和团运动、门户开放政策，并扩展了对中国事物的了解。

义和团屠杀在中国的传教士，围攻北京，还有欧洲、日本、美国军事力量的营救，这一切把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艰难戏剧性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这些事件也强化了这样的政治信条，即欧洲在中国持续的领土和殖民特权扩张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威廉·麦金利总统的国务卿约翰·惠特尼·黑阐述了“门户开放政策”，即寻求说服欧洲和日本不再扩大地盘或侵犯中国的主权。其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地盘的美国
17 获得平等的商业机会，在改变亚洲权力平衡中起到作用。美国也担心为义和团起义向中国索赔金额过大——超过三亿美元。中国当局和美国传教士都参与游说美国退还一部分赔款。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年中，清廷开始实施教育和政治改革，这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意味着影响中国的新机会已经到来。19 世纪传教工作的放缓让许多人，包括一些传教士相信，教育既可以推广基督教，也可以促进中国的改革。在国会关于如何处理义和团赔款豁免额的辩论中，教育获得了特别的关注，为中国年轻人设立奖学金，在中国建立一所美国大学均有提议。甚至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1907 年向国会提出的咨文里也提到了此事：“我国应该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在教育上帮助中国人民，这样，这个庞大的、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才能逐渐让自己适应现代环境。”²²

所有这些兴趣，在老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二世与格池的通信中都有所反映。²³然而，最有影响的还是1906年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的一封信，它吸引了格池和洛克菲勒二世的注意力。在这封信里，贾德森力争在中国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们深感应该尽早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它明确是基督教的，但在性质上完全是非教派的，拥有最高的理想和最广泛的普遍性。”²⁴这当然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模式，洛克菲勒二世和格池都全心全意支持这一想法及赴华的探索旅行。几个月之后，格池向一位知名的传教家阿瑟·史密斯报告说，今后洛克菲勒对中国的资助更可能流向教育而不是传教：“而且，和传教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间办公室可能创建的任何组织都会更适于从事教育而非传教。”²⁵

很有代表性的是，老洛克菲勒并没有立刻对所提议的中国探索之旅感到热情。他担心所需的资助数额和项目的开放性。他儿子写了好几封信才把他说服。洛克菲勒二世把提议的中国之旅同新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基金会的计划联系起来。1907年，老洛克菲勒同意了洛克菲勒二世与格池的提议，为一个新的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了一大笔钱，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因为新基金的工作范围是国际化的，洛克菲勒二世坚决主张“针对那些遥远国度的教育和宗教状况，我们必须有更充实、更精确的资料，然后才有可能在新的、更广泛的章程之下，开创这类的教育或文明工作。”²⁶这说服了他父亲拨出所需的2000万美元。再进一步，格池下令通知中国政府，洛克菲勒准备出资10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所美国大学。 18

1908年和1909年对亚洲和中东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访问由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率领：伯尔顿（神学）和钱伯林（地质学）。这一代表洛克菲勒的探索代表团后来被叫作芝加哥考察团（Chicago Commission）和东方教育考察团（Oriental Education Commission）。虽然考察团的报告涉及了多国的教育发展，但其焦点是中国。考察团的建议形成了洛克菲勒以后二十年中国慈善事业的指南。伯尔顿的结论是，中国不确定的政治和教育条件不允许创建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大学。传

教士们反对建立一所世俗的大学，而清政府正开始创建自己的现代化教育体制，也不倾向于给予一所外国大学全权。如格池所言，“即便洛克菲勒先生承诺肯出 1000 万美元建立一个基金会，也不能诱惑中国政府容忍我们将建的学院，哪怕它没有任何宗教倾向，除非我们同意让中国政府任命的人来控制和管理这所学院。”²⁷即使在清政府垮台前两年最虚弱的时刻，中国官员也不愿意把高等教育拱手让给一家外国机构。

伯尔顿并未完全受挫，他在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在中国可能建立美国的或美英的，或教会或世俗等各类大学的种种想法。尽管如此，在谈到与前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对话时，伯尔顿反思了在华美国人所面对的变化中的教育环境。他得出两个深远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当前传教教育需要休止。伯尔顿逐字引用李提摩太的原话：“传教士们在过去已尽了最大努力，但要继续奉行自下而上的施教策略则是愚蠢透顶。在顶端、最顶端施教，其余的会自行解决。受到最好教育的人会教育其他稍低者，依次向下，等等。”第二个结论是，在中国，科学医学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李提摩太博士本人没有如此表述，但他所提议的其实就是一所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²⁸

格池和洛克菲勒二世热切地阅读了伯尔顿的长篇报告，它也成了后来所有有关中国的洛克菲勒会议的标准背景阅读材料。两年后，格池重新回到伯尔顿的建议，并且写道，“我们企图在大学教育中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中国的医学领域能否做到呢？我们能否立刻在中国尝试科学医学？”²⁹他和洛克菲勒二世继续筹划新的基金会，心怀中国和医学。

洛克菲勒最初试图为这个新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求联邦许可，但这
19 一请求恰与最高法院关于解散标准石油联合裁决的辩论巧合。经过三年的公开辩论之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为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颁发联邦许可。洛克菲勒于是转向纽约州，在 1913 年正式组成了基金会。老洛克菲勒给基金会的总资本是 2.41 亿美元，包括 1929 年从斯贝尔曼纪念基金中转来的款项（见第二章）。那时及以后，很多人得出结论